◆经济学家

“中等收入陷阱”纯属危言耸听

□王东京

勿须讳言，近两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人断言是因为遭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早就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只是当初并不以为然；近来读报看电视，发现拿“陷阱”说事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还据此料定中国经济已到拐点，从此会走下坡。而背后的潜台词是，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道迈不过的坎，规律如斯，面对经济下行就只能听天由命，谁也无力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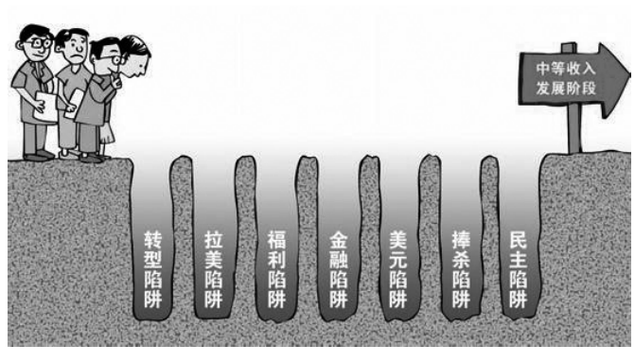
是这样么？说实话，我个人不同意将当下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相联系，甚至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本身我认为也有诸多疑点。这些天我查阅文献，发现有个现象很奇怪，众人皆说中等收入有陷阱，口口相传，可并未见有哪位学者对为何有“陷阱”给出论证。简单的分析是有的，不过都似是而非，难以令人信服。问题是，用一个有待论证的“理论”给中国经济下定判，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失之草率呢？

我看到的文献，“中等收入陷阱”的发明者是世界银行。2006年世行发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此概念，意思是说，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通常会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即在工资成本方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高新技术方面又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上下被挤压，于是中等收入国家很容易陷入增长停滞期。乍一听，似乎不无道理，然而深入想却疑点多多。让我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比低收入国家高，这当然是事实；而在高新技术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存在差距，也是事实。然而这事实怎可推出中等收入国家必陷入停滞呢？不要忘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但技术水平却比低收入国家高。同理，中等收入国家技术水平不及高收入国家，可工资成本也相对低。故与低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在技术上具有优势；而在工资成本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具有优势。这样看，中等收入国家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谁说中等收入国家只能用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天下没这道理吧。

其次，一个新理论能否成立需经过实证，只有经过实证未被推翻理论才算成立；若一旦被事实推翻，理论就不成立。“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成立？赞成者大多举东南亚与拉美国家为证：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为1812美元，而到2008年达8209美元后就徘徊不前了；再看阿根廷，1964年人均GDP约1000美元，上世纪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2008年又回升到8236美元。东南亚与拉美类似的例子多，经数十年努力都一直未过1万美元。

以上举证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但要指出的是，科学验证的重点是证伪而非证实。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家均认定乌鸦是黑的，但若有人举证有一只乌鸦是白的，那么“乌鸦是黑的”就被推翻了。验证“中等收入陷阱”也如是，只要能举证有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未落陷阱，则“陷阱说”就立不住。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当然有。比如：今天高收入的美国当年就未遇陷阱；日本1972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到1984年就突破1万美元，由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只用了12年；韩国的时间更短，只用了8年，1987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1995年就达到了11469美元。



再次，经验说，不论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经济都可能出现停滞。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一战后便风光不再，今天在经济上已成二流国家；美国堪称世界经济老大，可上世纪70年代也曾出现停滞，6年前还爆发了金融危机。低收入国家呢？经济停滞的例子更多，俯拾即是。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增长停滞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可能出现，并非中等收入国家所独有，那么有何必要危言耸听，搞出一个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

回头再说中国经济。当下经济下行原因有多方面，主要的：一是近年来欧美经济不济，中国对外出口受阻，外需明显减弱；二是国内产能过剩，调结构需要时间；三是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PD达56万亿，基数如此之大，增速放缓不足为怪。显然，以上这些因素皆与所谓“陷阱”无关，是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若硬性将这些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无疑是庸人自扰，除了误导决策，我看不出会有半点用处。

曾说过多次，对中国经济前景我一贯看好，今天仍不变。事实上，中国也有自己的竞争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基础雄厚，技术水平虽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比低收入国家要先进得多；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一些，但比高收入国家要低得多。这正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只要我们扬长避短，减少体制掣肘利用好自己的优势，长远地看，对中国经济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

当下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调结构。产能过剩必须调结构，阵痛在所难免，增速也会低一点，但这是必付的代价，决策层要有心理准备，也要有自信与承受力。二是扩内需，外需不足内需补，舍此别无选择。中国近14亿人口，扩内需得天独厚，我敢肯定，若能将国内需求带动起来，中国保持10年7%增长绝不成问题。至于如何扩内需，限于篇幅容我另文谈。

◆经济时评

负利率是柄双刃剑

□蔡恩泽

6月5日，欧洲央行抛出货币调控组合拳，将隔夜存款利率由0降至-0.1%，基准再融资利率下调至0.15%，边际贷款利率大幅下调35个基点至0.4%。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负利率。这标志着欧债危机5年后，在欧元区通缩压力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欧洲央行试图通过负利率政策救市。欧洲央行也成为全球首个实行负利率的主要央行。

当欧洲大陆沉浸在庆祝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兴奋之中，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却断然将其引入一片“滩头”。前一次登陆是为了让欧洲从一场惨烈的战争中挣脱出来，而此次抢滩，是为了将欧洲从一场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

那么欧洲央行缘何选择在当下下此历史赌注呢？

这要从欧洲央行的使命说起。欧洲央行的使命是通过设定通胀率接近2%的目标，以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为实现这个目标，欧洲央行通过设定利率来影响通胀。如果央行希望压制通胀，通常会用加息来加大借款代价，将货币赶进储蓄的笼子，抑制消费，以降低物价。相反，如果央行希望应对紧缩，就会降息，把货币逼出储蓄笼子，促进消费，以提高物价。

而为了维持商业银行间相互拆借的货币市场正常运转，隔夜存款利率、基准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又不能过于接近。鉴于此前欧洲央行隔夜存款利率已经为0，再融资利率为0.25%，下调再融资利率至0.15%意味着央行存款利率下调至-0.10%才能维持这个利率通道。

欧洲央行实施负利率，凸显欧元区通缩问题的严峻性，欧洲央行决心与之对抗，及时亮剑，遏制紧缩。来自欧盟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5月CPI同比增长0.5%，不及4月0.7%，可见4月份受复活节的影响，CPI出现了短期上升。欧元区4月失业率11.7%，相比预期和前值，再次下降了0.1%，创下2012年10月以来新低。5月CPI数据表明，欧元区仍无法摆脱通缩风险。欧洲央行采取负利率措施后，银行将为留存央行的隔夜存款再掏腰包，支付利息。这样做，势必增加银行的运营成本，刺激银行放贷的积极性，把更多的资金投放市场，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降低通货紧缩预期。

欧洲实施负利率，意味着欧元贬值。根据最先实行负利率实验的丹麦的经验，此举的目的是希望降低欧元区的市场利率，避免更多海外资金流入欧元区，鼓励投资者在其他投资上寻找更高的回报。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帮助央行扭转货币过度升值的态势，狙击热钱的流入。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欧洲央行主动打压欧元，更像是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过招。美联储维持的低利率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可是也让欧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其实，如果美国国债收益率预期增长、美元持续走强的话，欧元区通胀率就可能提高，紧缩就可能缓解。但美联储宣布退出QE并没有带来通胀预期的结果，今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增反降，美元也持续疲软，这让欧洲央行失去耐心。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曾直接批评美联储，现在不过是采取行动，与美元展开贬值周旋而已。

但是，负利率也是一柄双刃剑。

首先，实施负利率将对储户利益造成损害。针对有人担忧负利率将损害储户利益的疑问，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解释道，“欧洲央行的利率水平实际上处在较低范畴，必须特别警惕负利率，我们仍可能对利率做出调整。我们并未剥削储户的利率，央行的利率变化是针对银行，而不是人民”。虽说这样的解释能自圆其说，但是，银行毕竟不是福利机构，负利率导致银行运营成本提高，势必将其转嫁到广大储户即“人民”头上。当然，从理论上说，从长远看，负利率最终将有利于储户，因为负利率支持经济增长，进而创造一种有利的经济环境，让利率逐步回归较高的水平。可是，储户的眼光不会有这么远的。

其次，负利率政策在发挥抑制资金流入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加剧流动性紧张。人们担心，负利率对货币市场基金的冲击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低利率靴子压迫下，货币市场基金往往难以获得良好的回报率，从而导致行业趋于萎缩。货币市场基金是银行和企业短期资金的重要来源，倘若其发展受阻，势必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2012年7月欧洲央行隔夜存款降至零利率之后，欧洲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规模就日益萎缩。如今又下调至负利率，将导致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快速收窄，加剧欧元区信贷紧缩，进而削弱市场信心，加大经济增长压力，增加欧元区通缩风险。

再次，负利率严重影响挂钩欧元的外币理财产品收益。外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品本身的预期收益率，另一方面是汇率变动的汇差收益。欧元负利率所造成的欧元贬值直接影响汇差收益。DM理财实验室为理财者算了一笔账。外币理财产品的委托管理期限一般为半年至一年。假如2014年6月购买一款一年期的欧元理财产品，目前欧元/人民币汇率为8.41。摩根士丹利预测，欧洲央行负利率的政策将维持长期低利率的宽松倾向，欧元可能大幅贬值，到2015年第3季度其指数有可能贬值至1.20。假设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6.3，明年第3季度，欧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6.3×1.2=7.56。则汇差收益下跌为：(8.41-7.56)/8.41=10.1%。如果购买的该款欧元理财产品的到期收益率为3.10%，考虑汇率换算，投资者实际收益率为：3.10%-10.1%=-7%。这意味着投资者手中的欧元理财产品面临欧元贬值将严重亏损。

正因为负利率是柄双刃剑，所以坊间对负利率的导演者德拉吉褒贬不一。有人称赞德拉吉以他的勇敢之举实践了其“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欧元区”的承诺。有人则认为德拉吉此举是孤注一掷，把欧洲央行带入一个“未知水域”，像个赌徒。无论是勇敢，还是赌博，负利率这柄双刃剑都会让德拉吉承受煎熬，一切都要等待市场最终反应。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市场作用认识的三次飞跃

□王天义 裴会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得益于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通过市场作用的发挥释放出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回顾和审视改革开放中我们对市场作用认识的深化过程，可以为我们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鉴戒和启示。

市场调节作用的不断提升（1978—1992）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92年间，对市场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尊重价值规律起航、从计划经济中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市场调节的全覆盖，再到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一个渐进的理论和政策不断提升的过程。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是通过市场发挥作用的，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就是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其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明确提出，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要贯彻“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有限度承认市场调节的作用，是一历史性进步，但这种调节还只能限制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之内。逐步摆脱这种陈旧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重要作用。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逐步实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等新的论断。当年10月份，中共十三大报告中不再提“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等字眼，更强调的是商品经济的特性，并明确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较之前一时期，市场作用的范围和内容扩大了，从有限度、小范围扩展为大量、大范围，从计划附属到和计划并驾齐驱、各擅所长。自此，在决策层面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转变。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不断强化（1992—2013）

改革开放从1978年年底到1992年的10多年来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的作用。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一次从理论上廓清了重大问题上的一些迷思，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扩大范围的调节手段，而是一种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层面的路径选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就是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案》，将宪法序言中“实行计划经济”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加快所有制等基本制度层面的改革，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重要论断。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生效，中国政府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和开放市场。至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已经形成，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初步定型。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正式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

为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推进公平准入，破除体制障碍；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不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就是传统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逐步形成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协调发展的国民经济三分天下。通过所有制改革实现了以产权多元化为核心的经济多元化，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奠定了一般制度基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确立（2013—）

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定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是起调节作用、基础性作用，还是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要回答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守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一新的定位，是对市场作用认识的又一次深化和飞跃，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就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是，对通过什么形式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并不是十分明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相互包容和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通过制度规定，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得到同等保护，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之间自由流动，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展开公平的自由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供求和竞争形成价格，通过价格波动引导资源流向，实现优化配置，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是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放开石油、天然气、自来水、交通、电力、电信等领域的价格；规范土地市场价格，使得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在财产权力、市场准入、价格制定和收益分配上的平等地位，逐步实现同等入市和同权同价。

对市场作用认识变迁的几点启迪

回首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我们对市场作用认识的三次飞跃，解释市场作用提升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历史进步，揭示其间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可以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重要经验。

每一次对市场作用认识的提升都伴随着政府作用的调整。对市场作用认识的变迁过程，其实就是市场和政府关系不断调适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期，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体现为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我们的改革发轫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完全掌控着资源配置，改革者们在尊重现实体制的前提下，以尊重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和发展商品经济为诉求，先从计划控制薄弱的农村改革切入，从小商品入手，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培育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容许市场对部分资源进行配置。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日益突出，改革步伐就适时加快，提出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相应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也逐渐变为市场基础和国家调控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和我们对市场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作出新的界定，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做的就交给市场和社会，政府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更好的服务。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体现出政府的自我谦抑和包容性政治智慧。所谓的包容性政治智慧，是在坚持政治原则和法律底线的前提下，确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民生福祉为最高追求价值，其余价值覆于其下，此为包。在应对和解决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时，容许矛盾和争议存在，对矛盾和争议各方的合理性都予以承认和尊重，寻找结合点，允许各方从不同的视角和思路、采取不同的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实现不同方向的合力促成问题的解决，此为容。包容的最终目的是在发展中汲取经验，教育和改变矛盾或争议的各方，形成新的认识、达成共识，共同前进。在充满对崇高而完美理想向往的同时，对于不完美的现实勇于直面，坦然包容，一点点研究新情况，一步步解决新问题，在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断飞跃。

市场作用认识提升的三次飞跃，体现出政府的知行合一的高度自觉。在宋人沈括《续笔谈》中记载，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对以“道理最大”，太祖称善。对于以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共产党人来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民生福祉是最大的道理，这是“知”的智慧。要实现这种理想，还要有“行”的智慧。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政治乃众人之事，是一种社会治理事业，所面对的对象，千差万别，为了实现治理的目的，达到共同的进步，在实践中必须要采取以兼顾大道理和小道理，兼顾利益，平衡利益，循序渐进，稳步前行。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直面问题，对于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既要在“知”的方面有正确的认识，又要在“行”的方面有改革的举措。以知行合一的高度自信和自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民生福祉的大目标。